

史念海 主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二辑

顾颉刚题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二辑

史念海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3547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二辑

史念海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8 字数280,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65

统一书号: 11094·129 定价: 3.50元

目 录

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	顾颉刚 (1)
中华名号溯源·····	王树氏 (6)
“华夏”臆说·····	李得贤 (17)
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	史念海 (36)
河北省及北京市、天津市古今县释名·····	曹尔琴 (48)
山西古今县名刍议·····	靳生禾 (76)
浙江省县(市)名简考·····	陈桥驿 俞康宰 傅国通 (113)
福建古今县市的命名规律·····	庄为玘 谢元鲁 (128)
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	史念海 (145)
甘肃省县名的演变	
——兼论宁夏和青海两省区的部分县名·····	马正林 (211)
湖南省古今县名命名规律浅析·····	朱士光 (228)
以辽宁古今县名为例探索地名命名的某些规律·····	薛作标 (246)
试论吉林省古今县命名的特点和规律·····	王兆明 高明全 (269)
论新疆各县的命名、改名等问题·····	李之勤 (281)
台湾省地名类型和县、市级地名的演变·····	吴壮达 (300)
论黄土高原的治沟和治水·····	史念海 (341)
对黄土地层古植被研究中困难问题的探讨·····	朱志诚 (376)
《水经注》记载的植物地理·····	陈桥驿 (384)

4638/02

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

顾颉刚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弄臣，滑稽取乐，玩世不恭，所以当时人觉得他有趣，都喜欢传述他的故事，好象现在人讲徐文长的故事一样。《汉书·东方朔传》末了，班固写上一笔：

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

显见他这篇传文是根据刘向所录的朔事，他只信刘向所录而不信别人录的，因为别人录的更显得诡诞，刘向的态度比较严肃，自然可靠的成分为多。传中又说：

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

他这样的重言申明，足见当时假托的东方朔故事实在太多了，他真成了滑稽的箭垛！

不想到了南北朝时代还有两部他的假书新做出来，为郦道元所见而采入《水经注》。这两部书，一名《神异经》，是模仿《山海经》的，所以也以“荒经”标题；一名《十洲记》，是模仿邹衍的大九州说的，说大海之中的十个大岛。

这两书中都说到昆仑山和西王母，描写得比《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还要绚华。《神异经》中的《中荒经》说：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员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

作者把昆仑与西王母放在《中荒经》，足见昆仑为天地之中的学说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他把西王母与东王公为配，这是从西王母这个名词上化出来的。然而既名为东王公，自然该住东方，所以他的《东荒经》说：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

因为《汉书》里有“西王母石室”，所以他为东王公也预备一所大石室。因为《西山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所以他也为东王公写成“人形鸟面虎尾”，显见得恰恰相配。至于这头大鸟，一半取自《西山经》里侍奉西王母的三青鸟，又一半则取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鵬鸟。不过这大鵬鸟虽已竭庄子的想象力，说：“鵬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

之云。”又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究竟天地之大，它尚有回旋之余地。现在这头希有鸟，它的左翼覆了东荒的东王公，右翼覆了中荒的西王母，已经充塞了半个世界的天空，叫它怎么奋翅高飞？西王母要见东王公时，也不见得方便吧？

至于《十洲记》里的昆仑，则又是一种写法：

昆仑，号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回绕币。山东南接积石圉，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洲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圉南头是王母居。周穆王云：咸阳去此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故名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阊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其北户山承洲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璇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网柄矣。

这位作者把昆仑说成了“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网柄”，使得它对于人生发生了实际的效用。它为万汇所托命，地位的高超还了得！依五行学说，戌在西北，亥稍偏北，这里说“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等于说西海之西，北海之北，那么昆仑是在最西北

处，与《神异经》把它列在“中荒”又不相同。说“去岸十三万里”，又似孤立海中然。弱水周回绕币，取自《淮南子》。四角大山，只有积石为以前所见，若北户则是理想中的极南地名。那时人想象极南到了太阳的南边，应当开户北向方进日光，这名见《吕氏春秋》和秦始皇《琅邪刻石》，现在把它移到西北，又作为山名，是前所未见的。昆仑四角既有大山，山上又有了三角伸出。闾风悬圃本是昆仑的层名，现在成为凸出的三角，把立体变成了平面。山高三万六千里，比《淮南子》所说的又加高三倍多。西王母所居在积石圃的南头，则是在东南方，已经出了昆仑区；但她所治则是承渊北户两山上的墉城。这些墉城里面有金台、玉楼、碧堂、琼室、丹房，多么的美丽。这或者是汉武帝求仙时造的“五城十二楼”的反映吧？

除了昆仑，《十洲记》里又把钟山描写了一下：

其北海外又有钟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万九千里，高一万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万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余种，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舍，天帝居治处也。钟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龙山，西有劲草山，东有束木山，四山并钟山之枝干也。四山高钟山三万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见钟山尔。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经自一路，从平邪山东南入穴中，乃到钟山北阿门外也。天帝君总九天之维，贵无比焉。

这把钟山也说成昆仑的规模，四面四山，几乎都有昆仑那么高，每个山上都有天帝君的城域，这是他总治九天的地方。子为正北，则钟山在北海的正北。这两个大山，比《山海经》和《淮

南子》里排场阔气了多少？

南北朝时代，道教在寇谦之和崔浩等人的提倡之下，声势极盛。这两部假东方朔的著作该是道士们做的。昆仑山的神话，他们已尽量国货化了。

中华名号溯源

王 树 民

一九四〇年，我写过一篇《中华名号起源考》，刊于在成都出版的《责善半月刊》创刊号上。当时处于抗战流亡生活中，参考书十分缺乏，所用资料为平日偶然记下者，仅指出“中华”一名为“中国”与“华夏”二名之合称，并为“中国”与“华夏”二名之由来略作论证。到一九七八年，从《尚书·康诰》篇“区夏”一词与后世所用者大有区别而得到启发，曾写成：《“区夏”试释》一文就正于顾颉刚先生。恰好顾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于是由顾先生和我二人合写了一篇《“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上，对于追溯“中华”一名的来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好比一条大河，上游有两个源流，察看清楚这两个源流，下游也就有着落了。现在以那篇论文为主，先简略地看一看“夏”和“中国”两个名号的由来。

夏朝是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最早建立的朝代。夏代的文化生活特点是以农耕和城居为主，农耕须注重水利，所以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论语》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又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筑城而居是从事农

耕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是定居生产的可靠保障，所以《世本》说：“鲧作城郭”（《作篇》），又说：“禹都阳城”（《居篇》）。阳城即建筑于山南或水北的城。可知夏代时已经具有了古代城邦的形式。后来夏朝为商朝所代替，而农耕和城居的文化生活方式并未改变，所以夏的名号也依然保留下来。城中之地也称为国，住在城中的人即称为“中国人”或“中国民”，简称为“国人”，以区别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民。故《说文·文部》云“夏，中国之人也”。《说文》多保存古义，此亦其一例。但许慎于此古义的来历并不了解，于是按照六书中的象形字要加解释。他说：“从文，从页，从白，白两手，文两足也”。实际上任何人都有两手两足，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特征，可知其为出于主观臆测。这时所用的“中国”二字不过为“国中”之意，还不是专用名词。

《尚书·梓材》篇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所称的“中国民”及其“疆土”，是指周统治者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土地和人民。周的起源和夏有密切关系。《国语·周语上》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典训，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原来周的祖先是夏朝管理农业生产的官。他们世代充任此职，当然不是一个人，但传说把后稷说成为一个人，并且是古代名气很大的农业专家。

周人的文化生活既由夏代传来，周统治者直接统治的土地即其城邦之内，仍沿袭夏的称号，称为“区夏”或“有夏”、“时夏”。《尚书·康诰》篇：“用肇造我区夏”。《君奭》篇：“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

时夏”。又《思文》：“陈常于时夏”。都是明显的例证。“区夏”即夏区之意，也就保持夏文化的地方。“有”字为语助词，如虞也称为有虞氏，是其例。“时”犹是，即这个之意，作定语用。“夏”字原为专指夏朝的专名词，既发展为保持夏文化的地方，渐有通用名词的性质。在周朝的统治地位巩固后，“中国”之名逐渐演变为专指周王的统治区域，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与“京师”互称，正表明其涵义相同。这样就使“中国”一词逐渐专用化，与“夏”字由专名词逐渐通用化的方向正相反，二词的演变殊途同归，同为表示周文化直接统治的地区。

二

周朝灭商，巩固了天子的地位以后，按照周王国的组织形式，分封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的统治者都是周王的子弟、同姓或亲戚，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同于周国，只是规模稍为小些。既由周国分出，所以也可以称为“夏”，又因数目很多而称为“诸夏”。在政治上、历史上以及亲属关系上，“诸夏”和周都有密切的关系。《左传》僖二十一年云：“蛮夷猾夏，周祸也”。正反映着这种关系。又闵元年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说明“诸夏”与戎狄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的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东迁到洛邑，实力已远不如西周时期，而列国则大有发展。如晋国以建立都邑的办法，逐渐蚕食戎狄的游牧地区。《左传》庄二十八年记云：“狄之广漠，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国果然逐渐强大起来。又如郑国，乘东迁之际，吞灭了附近的十个小国，成为周王附近最强大的国家。所

以周人自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国语·周语中》）

“诸夏”国家向外发展，和夷狄国家发生了剧烈的争夺，“诸夏”国家有联合抗御夷狄国家的必要，周王既不能负统帅之责，霸主便应运而兴。强调“诸夏”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加强联合的力量，所以“诸夏”之称在春秋时期多见使用，因而推衍出一个“华”字来。按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其音相近，增用一字有加重语气的作用。二字可以单用，亦可以合用。《左传》定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和“华”二字互举为文，正与裔和夷二字互举为文相同，都是加重语气的用法。又如襄二十六年云：“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华夏”指以郑为首的中原诸侯，与“诸夏”之词为同义。亦可称为“诸华”，如襄四年云：“诸华必叛。”又昭三十年：“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诸华”之义与“诸夏”全同。以“华”字单用者，如襄四年云：“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又襄十四年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字的用法也与“夏”字无所区别。

以“华”为名号，最早见于《左传》，即“诸夏”之名盛行时期，其来历旧无定说，而皆不可从。《诗·小雅·苕之华》郑玄笺云：“陵苕之干，喻如京师，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此说出于推测，而尚着意于“华”与“夏”的关系。伪《尚书·武成》篇《孔传》云：“冕服采章曰华”。《正义》云：“‘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是从儒家理论而作之望文生训的解释，全无足取。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写过一篇《中华民国解》，收于《太炎文录·别录》中，谓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分别以夏水（即汉水）和华山而得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说有加强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且章氏为国学大师，故世人或从其说，其主要依据为当时西方学

者散布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别无史实依据，而中国人种西来说早已粉碎，故其说亦无可取，而不必深论之。

在霸权盛行的春秋时期，“诸夏”、“华夏”等名号广泛使用。到战国时期，列国争雄成为主要特点，所谓列国即由“诸夏”国家发展而来。在他们互争雄长的形势中，“诸夏”的名义起不了号召作用，所以一般的也不再使用，偶有用者，也是表示一定的地区，而不是表示某些国家。如《荀子·儒效》篇云：“居楚则楚，居越则越，居夏则夏。”这个“夏”表示的是中原地区而不是那里的国家。在列国相争的时候，“定于一”的思想已经产生（《孟子·梁惠王上》），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华”、“夏”等字既不适用，而“中国”一词便广泛地使用起来了。

三

春秋时期以前，我国全境原无固定的称号，一般的为据历史传说称为“禹甸”或“禹迹”、“禹域”等，又以自然形势称为“天下”、“四海”、或“九州”、“九有”、“九域”、“九隅”等。大禹治水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传说，而自然形势最容易为人了解的是四方四隅加中央，与“天下”、“四海”等均为空泛的概念。这几种概念也可以结合起来，如《左传》襄四年引《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其实这个“禹迹”和“九州”的范围，都不够明确具体。

春秋时期，列国有时也称为“中国”，如《左传》成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中国”即指“诸夏”国家而言，但当时使用者较少。到战国时期，各国疆域紧密地衔接起来，所谓“禹迹”的概念已经明确具体了，用

“中国”一名表示“禹迹”的范围原无不便之处，但“禹迹”内部如何划分？“中国”与“四海”的关系如何？都成为不容易说明的问题。

禹迹内部的划分即关于九州的划分。有以山川形势为依据的，如《尚书·禹贡》之“济河惟兖州”，“淮海惟扬州”等。有以重要国家的位置结合山川形势与方位为依据的，如《吕氏春秋·有始览》之“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东方为青州，齐也”等。有以方位为依据的，如《淮南子·地形》篇之“东南，神州”，“正中，冀州”等。有结合方位与地形为依据的，如《逸周书·职方》篇（《周官》改为《夏官·职方氏》）之“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等。有以地形及国家位置为依据的，如《尔雅·释地》之“两河间曰冀州”，“齐曰营州”等。这些分歧的说法，表明这决不是古代实有的制度，不过为满足当时人地理知识要求的一些想象之词而已。

关于“中国”和“四海”的关系。按照旧的传统概念，“四海”和“禹迹”是相当的，“中国”的范围既然和“禹迹”相等，自然也就和“四海”的范围一样。如《禹贡》一再说，“四海会同”，“声教讫于四海”，都是把“四海”和“中国”看成为同样的范围。《礼记·王制》篇更按照这个原则把“中国”也就是“四海”作了具体配置：“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这个“方三千里”的“四海之内”，就是指的“中国”全境。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早已扩大了，所以“四海”的概念也放大了，《禹贡》和《王制》

的说法不过是保留了传统的概念，注重实际情况的人早已提出新的说法来了。

《吕氏春秋·慎势》篇云：“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这是划定“中国”的范围，与《王制》和《禹贡》之说相当，但不说是“四海”的范围。《有始览》云：“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管子·地数》篇也说：“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可见这个说法在战国时为多数人所承认，比起方三千里的“中国”之地广大得多了。《庄子·秋水》篇云：“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也是同意打破传统说法的。

这时还有一个齐国人邹衍，既接受了禹划九州的说法，又获得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大九州说。按照邹衍的说法，“四海”之内有九个州，“中国”为其中之一，“天下”更有九个如同“四海”的大州，所以“天下”是“中国”的八十一倍（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说法虽然缺乏事实根据，但把本来看为同样大小的“天下”、“四海”和“中国”，重新排列了大小的比例关系，说明对于“中国”的概念，在笼统的意识中更逐渐具体化了。

两汉时期，承战国以来的趋势，以“中国”为我国的通称，无烦举例。其后历代或分或合，实际涵义亦略有伸缩，大致统一时期多指全国疆域，分裂时期则指中原地区。而由于汉代统一时间较长，社会文化向前发展，人们渐有使用更多名号的要求，同时学术上有复古思潮的兴起，一些旧名号也重新使用起来，尤其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创立新名号及复活旧名号成为一时风行之事。就其中与“夏”字、“华”字有关者而言，旧有者如“诸

夏”、“华夏”、“区夏”等，新创者如“中夏”、“函夏”、“方夏”等，各名号不论其原义如何，此时所用者皆与“中国”一名之义相当。而“中华”一名亦从此始见于史书记载。

四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华”名号的使用首先是在天文方面。

《晋书·天文志》载《天文经星·中宫》：“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辅也”。《隋书·天文志》同此。这是以世间的宫城比拟天宫的构造，东西两面各有三个门，中间之门以“中华”命名，两旁者则以太阳和太阴命名。阳和阴，古人常用以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间，在古人的观念中，“中国”应是最大的了，所以汉代的扬雄说：“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卷四）。古人又不便以“中国”之名用于宫门，于是从“中国”与“华夏”二名号中各取一字而称为“中华”，以配合太阳、太阴之名，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晋书·天文志》称《天文经星》为魏晋时期的太史令陈卓所定，这个名号最晚当定于陈氏，更可能是出于陈氏以前的天文家之手。

天宫既然可以用“中华”命名，世间某些统治者便也多用“中华”为宫门之名。如后赵石虎的宫中即有“西中华门”之名（《晋书》卷一〇七《石虎载记》），又北魏宫中也有“中华门”之名（《水经注》卷十三《洛水注》）。《北史·叙传》称李宏为“中华令”，应即为主管此宫门之官。南朝的梁也有“东、